

亲历者口述实录

民初纪元

台湾「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

刘凤翰 主编
陈星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台湾“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

民初纪元

亲历者口述实录

刘凤翰 主编
陈星 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初纪元 / 陈星编著. —2 版.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00-9720-4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民国
IV. ①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495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李 晓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720-4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辛 旗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学术界风靡一时。作为一种史学新流派，虽说发端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然考其源流，实滥觞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众多形同“口述历史”的经典了。“六经皆史”，其中就有大量的口述。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延续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论语》，亦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口述历史”。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问夫子之语也。”《论语》除了其思想、人文价值外，我们从中亦可探寻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俗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其史学价值自不待言，或可称作“有韵之《史记》”。《礼记·玉藻》中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中国古代早就有专门记载“口述历史”的史官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传统的传承与光大。

“口述历史”项目最初是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拟订并组织实施的。历时40余年，共收集整理70多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记忆资料。受访者都是近

现代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知名人物，或是与重要人物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党务要人、民国军政元老、科学教育方面的著名学者、经济及工业界人士、社会名流等，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而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从“台湾口述历史”项目所搜集编撰的120余种访谈录中，精心筛选后，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的。这些内容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丛书》之外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士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列读物。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命运多舛、艰难困苦的时代，亦是一个奋发图强、英才辈出的时代。这套书里既包含了当事人血泪沧桑的经历、颠沛流离的人生，以及一种痛入骨髓的情感，也包含了他们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感叹和抵御外辱、献身民族的理想与志向。这样的历史才是丰厚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但是，该书的口述者大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其忆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所述内容皆为个人所见所闻，其中难免有记忆不周之处，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这就需要我们阅读时能兼收并蓄、去伪存真。他们许多看法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因为它给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只有多面向的历史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也使得这套书的出版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其一，补阙拾遗。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单凭文献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事件，不是没有留下文字，就是重要档案尚未公开，甚至有许多东西被涂上了太多的脂粉。那么这套口述历史，或许可以

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带来一份惊奇与裨益。

其二，承前启后。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书中的口述者是“所见世”，在今天我们这些人是“所闻世”。我们能听到当世人的讲述，是我们的幸运。因此我们亦有责任把这些“所见世”者掌握的资料记录下来，把许多事情弄清楚，留下信史，这样才有“所传闻世”。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才不会因此而断绝，中华文明才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其三，鉴往昭来。回顾近现代的中国，天灾人祸，更迭相加，国破家残，生灵涂炭。如今时过境迁，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处处散发着和谐之气。然《易经》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出版这套书，不仅是要提供一个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完整视角，更是要“以史为鉴”以“知兴替”，从而可拒乱，乃至升平，直至万世太平。

愿我中华民族从此复兴，永享盛世。

泛泛为之一序，无以益其善美。

李 旗

2009 年 3 月 16 日

导 言

陈 星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国肇始，百废待举。满清的统治在革命的冲击下轰然倒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加快了嬗变的速度。在辛亥革命造成的全新舞台上，各种新旧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相对于以往的“革命”而言，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转变是自晚清（1840年以后）以来最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也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必然结果。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一直没有中止。从洋务运动对西方在器物层面的模仿到甲午战争后的思想启蒙，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呈现出由浅入深的不同层面。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增加了现代化努力的紧迫性，也增加了当时中国政局的复杂性。现代化过程中，旧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经历冲击功能渐失之后被破坏和抛弃，新的结构在不断地摸索与尝试中逐步建构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历时很久的“革命”，是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颠覆性过渡。正是这个原因，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转变就以异常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民国头十年（1912～1921）尤其如此。

辛亥革命：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

1911 年秋到 1912 年春这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相对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对于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学界的评价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这次革命并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是一场“假革命”；有的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像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这次革命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而已；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则持不同的说法，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这次革命形成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 20 世纪社会革命中的 1900 ~ 1913 年阶段，不应仅仅看作是整个政治变化的 1911 ~ 1912 年阶段。也有学者认为，这次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②。从总的方向和趋势上来说，目前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把眼光转向其所继承和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由辛亥革命所开启的革命浪潮。易言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被篡夺了，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是失败的；但是，经过这次革命之后，闸门从

①（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8 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 年。

② 辛亥革命相关学术争论的情况，见费正清前引书，下卷第 9 章。

此打开，道路因而开辟。此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就一浪高过一浪，再也无法遏止。^①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拜辛亥革命所赐。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②，基本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从最直接的政治结果来说，这次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为共和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从更为全面的结果来看，辛亥革命其实起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晚清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也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推动革命努力的集成。

辛亥革命之前，晚清政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首先，自从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主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大群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封疆大吏。他们和以前的督抚不同之处，不仅自己手里有只听自己指挥的军队，而且通过在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度，扩大了手中的财政权。^③ 于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控制与反控制的戏码再一次上演。满清贵族的势力实际上遭到了巨大削弱。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面对地方上日益滋长的反清浪潮，满清当局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镇压了。其次，自 1840 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失败对政治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对外战争的失败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传统士大夫心中的文化自尊。天朝上国的迷梦一旦被打破，就有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将检讨的目

①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1 页。

② 杨天石前引书，3 页。

③ 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241 页。

光转向政治制度自身。这种局面对清政府的合法性是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领土的割让，更使普通民众和部分精英阶层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19世纪末的自强和救亡图存运动固然反映了部分政治精英企图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意，但是同时更反映了满清政府合法性日益削减的现实。再次，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反清风潮越来越激烈，已经形成了不可遏止之势，甚至许多军队都受到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倒向了革命阵营。辛亥革命前夕“以相当多的留日士官生为军官的‘新军’各派都拒绝给中央提供支持。”^①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农民的抗捐斗争、各阶层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②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暴动，已经形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使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说明，在旧的政治体制内以旧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小修小补已经难挽大厦之将倾。按照钱穆先生的话说：“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③辛亥革命其实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舞台，“旧政权下的各种恶势力，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清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

①（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02页。

②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419～421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906页。

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于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①

仅事件本身来看，武昌首义的成功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然性。1911年夏季，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处置失当，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引发了1911年9月7日的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② 清政府调兵入川导致湖北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起义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但是由于泄密，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清政府则按照缴获的名册搜捕，逼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以前策划的起义，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孙中山自己，也没有想到起义会在突然之间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武昌起义所以有“首义”之称，主要在于它推倒了满清政府倒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士气大振，集中力量迅速攻占了南京。1912年元旦，民国政府建立，意味着新的政治纪元开始。

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实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当时政治情势变化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

① 钱穆前引书，906页。

② 费正清前引书，下卷第9章。

发展道路逐渐明朗

民国前十年中，旧的政治秩序被打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权威骤然消失，形成了政治真空。针对这种失序的局面，各种新旧政治势力在辛亥革命造就的广阔舞台上展开了激烈角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这次革命并不是建立在系统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相较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延伸与集成的道路，辛亥革命其实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先有政治革命然后再有社会革命。所以，这次政治革命不仅没能在短期内改变民众的政治观念，即使对传统的政治精英的传统政治思维模式也没有太多的触动。吕思勉先生认为：“民国的成立，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① 辛亥革命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激情掩盖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革命者在内，当时的政治精英对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状况并不清晰，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估计严重不足。

辛亥革命后，革命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化设计立即就遭到了现实的重击。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粉墨登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为共和理想展开斗争。也正是在这个

^①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286页。

过程中，一方面，旧的政治势力渐次被驱逐出历史舞台，而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旧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模式被逐步清理出历史舞台，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发展方向逐步得以确立。

概略说来，民国头十年中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封建复辟势力，其中以袁世凯和张勋为代表^①；其次是北洋军阀势力和逐步形成的地方军阀势力，后者多是袁死后所形成的政治势力；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四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由于本书所选内容基本上没有涉及第四种势力，因此我们主要阐述前面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与革命政府间的矛盾立即凸显出来。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凯的政治实力就已经迅速窜升，1911年11月终于受命组阁。面对南方的革命形势，袁的基本策略是，先“养寇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②革命者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在与袁的和谈中自然处于下风。虽然南京政府仓促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在制度设计上作了特别安排，使临时大总统既要受制于参议院，又要受国务院的制约；^③但是在袁的精心操纵和欺骗下，最后这些措施均成具文。

① 有的历史著作将民国元年4月至民国17年6月认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见史仲文、胡晓林等编：《中国全史·中华民国史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与本文将袁世凯划分为封建复辟势力并不矛盾。袁世凯虽然是北洋军阀，但是其复辟封建制度的企图也是有目共睹的。

② 唐德刚：《袁氏当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6页。

③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1卷，681~68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

革命的果实最终还是被篡夺了。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袁氏逐渐清除了北京政府中的革命力量，并打击了南方支持革命的地方势力（李烈钧等）。北洋军阀与革命势力之间的武装斗争再次爆发。双方历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斗争，到1916年终于将帝制自为的袁世凯驱逐出历史舞台。

袁氏称帝的失败与稍后张勋复辟的随起随仆，意味着封建帝制已经无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几派，各霸一方。主要有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等。他们为控制中央政权，互相激烈争夺，造成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战乱不已。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打着“中华民国”的幌子，披着“民主共和”的外衣，实行的却是专制独裁的军阀政治。北洋军阀之外，在支持革命和地方自治的旗号下，地方实力派的势力也开始扩张。例如，谭延闿坐大湖南，唐生智在云南的势力不断发展，广西则成为陆荣廷和唐继尧的天下。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的军事斗争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革命党人并没有自己的武装，不得不借助于这些地方实力派，从而给他们趁机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如钱穆先生所言，这一时期“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动摇，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①

这是一段政治情势极端混乱的时期。大小军阀们在统治过程

^① 钱穆前引书，908页。

中恢复了政治斗争中的“丛林规则”：^①军事实力成为决定政治势力大小的标准，武装斗争成为决定政治活动的关键性因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成为军阀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信条。“其时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②这段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袁世凯死后，中国确实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可言。即使是巴黎和会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国的代表团都是由南北政府合派代表的形式组成的。“直到国民党1927年以南京为首都再造共和，并开始扭转国家解体的局面，情况才有变化。”^③到张学良东北易帜时，才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同时，这十年也正是中国新的政治发展趋势拨云见日，日渐明朗的时期。其一，民众在进步与反动势力的不断斗争中逐渐走向觉醒，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其标志；其二，孙中山在依靠军阀进行革命斗争屡战屡败的惨痛教训之后，吸取了经验，开始组建革命军队，并开始逐步改组革命力量；三是无产阶级开始觉醒，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所以，这十年其实是中国的政治运动结束无序和耗散结构走向有序的开端。自1840年以来，历经林则徐禁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无序和内耗，由闭关自守到面对现实，由面对现实到师夷之长、以夷治夷，再进化

①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章，233～269页。

② 钱穆前引书，909页。

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前引书，239页。

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再到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国，直至“五四运动”后逐步找到政治解放的道路：^①这个过程殊为艰辛。但是毫无疑问，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与斗争的形势显然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新气象了。

宪政制度的尝试及其失败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光绪皇帝推行的改革措施中，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改革已经比较系统。清朝灭亡前，以西太后为首的政治集团所推行的新政，政治制度改革的幅度也很大。清朝设立的地方咨议局，在民国建立后犹在发挥比较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清政府当政的背景下，在中国大地上实行现代政治制度显然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阻力。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制度改革，各种现代政治制度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这些制度尝试对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辛亥革命后，南京的民国政府立即进行了宪政的尝试。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计了代表民意、行使立法权的国会，由国会选举产生并受国会制约的总统以及三权分立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以制度结构的视角观之，这是典型地采取硬性移植西方制度的办法来确立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例子。

^① 前引《中国全史·总序》。

从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制度移植有严格条件限制，它更强调“过程”而非“结果”。也就是说，制度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社会制度互相借鉴和取舍的过程，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制度及其规则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它是对别国或地区既有制度经验的采用，是不同空间条件下制度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使接受移植的国家能尽快完善或替代本国有缺陷的制度，或填补某些制度规范、原则及具体的制度方面的空白，以推动本国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提高本国的制度文化水平。^①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进行全面政治制度移植的环境。

民初宪政制度的失败以政党政治的失败为其典型。政党政治是现代代议制度的基础，是政治合法性更新的主要手段；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又是保证政治体系内力量平衡和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条件。

民国成立后确立了政党政治的基本政治原则。于是，在晚清政治体制中被排斥的政党如春草怒生，一时并起。有人统计，当时大约有 312 个政党、政团组织活跃在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舞台上。^②这些所谓的“政党”绝大部分根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想，更不能“以一种主义，为政治求根本之改造。各党所谓政纲仅为文饰之工具，政纲自政纲，政争自政争，以致政治日趋反动，使袁世凯造成专擅之政治，竟至帝制自为，反叛民国。政党政治，实属厉之阶也。”^③在本书所选的口述史资料中，钟伯

① 郝启秋：《制度移植与民初悲剧性政党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 3 月号。

② 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4 年 5 期。

③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84 页。转引自韦庆远等：《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566 页。